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三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一年十二月

東漢繆宇墓題記 「彭城相行長史事呂守長」疏證

鄒水杰*

東漢繆宇墓畫像石題記載其任職「彭城相行長史事呂守長」，學界對其任職的解讀多有分歧。通過與 7 例同類型東漢中後期文獻比較可知，繆宇實為彭城國屬吏，以郡吏之身分受彭城國相委派臨時擔任「行長史事呂守長」，以呂長之官印行彭城國相長史職事。「呂守長」表示他佩有呂長的「墨綬銅印」，可以「要帶黑紼」；「行長史事」表示他代理長史行事，處理相府文書。「行長史事呂守長」屬於一個職事的兩個方面，兩者不可分割。處於同一墓地的繆宇墓和繆紆墓規模較大，都有石刻畫像和題記，繆紆之父也遷葬於此，表明此處是繆氏家族墓地；二人有經學修養，繆紆之父又有關內侯的爵位，顯示彭城繆氏是當地的大姓士族。繆氏與彭城國相應有著良好的私人關係，故國相先後委任繆氏家族子弟以州郡少吏行郡縣長史事。這種地方長官與屬吏相互為用的關係，展示了東漢中後期地方行政的一種運作模式。

關鍵詞：繆宇墓題記 彭城相行長史事呂守長 郡吏 大姓士族

* 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簡牘所見秦漢邊陲地區的郡縣化研究」(20BZS027) 的階段性成果。

秦漢時代的文書行政中，多有以「守」、「假」或「行某官事」代理或兼任他職的權宜之事，學界也多有研究成果。¹ 但東漢時代的石刻文字和簡牘文書中，多次出現將「行某官事守某官」合在一起的表述，學者雖然也有過討論，但一般都受到思維定勢的影響，將其作為在時間上有先後次序的兩種職官來分析。² 以東漢地方職官和籍貫限制為背景，針對文書行政運作的場景作具體考察，可以發現已有研究對這一特殊的職官代理制度存在誤解。本文以繆宇墓題記為中心，重點從繆宇的身分與任職考察這種職官代理制度，並揭示東漢地方政治運行的某些特點，以求教於方家。

一・學術史回顧與繆宇職務的問題

一九八〇年冬，江蘇省邳縣文化館在邳縣西北 55 公里的青龍山南麓，調查發現了東漢繆宇墓。一九八二年南京博物院和邳縣文化館共同發掘了墓葬，徑稱墓內後室門口上方東橫額上鐫刻的畫像石題記為「繆宇墓誌」。題記文字部分剝落殘損，共十一行，除首行外，其餘大都每行九字，末行七字。發掘者根據「墓誌」首行文字，直接稱此墓為「東漢彭城相繆宇墓」，並認為：「繆宇任彭城相，行長史事，又兼領呂守長。」³ 然發掘者對繆宇是同時兼有三個崗位的職事，還是遷轉了三個遞進的職位，並未作出說明。⁴

簡報發表後，宋治民很快就針對繆宇的官職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在補白短文中指出，據墓誌第一行，知此墓主人的官職乃為「呂長行彭城相長史事」。他引

¹ 最近的研究可參看高震震，〈試論秦漢簡牘中「守」、「假」、「行」〉，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 4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頁 58-79；鷹取祐司撰，魏永康譯，〈漢代的「守」和「行某事」〉，周東平、朱騰主編，《法律史譯評》第 6 卷（上海：中西書局，2018），頁 94-124；王偉，〈秦代守官、假官制度考論〉，陳松長等，《秦代官制考論》（上海：中西書局，2018），第三章，頁 112-137。

² 由於學術史的內容較多且分散，故於正文中注出，而不單獨展開。

³ 南京博物院、邳縣文化館（尤振堯、陳永清、周曉陸執筆），〈東漢彭城相繆宇墓〉，《文物》1984.8：22-29。

⁴ 漢碑中有將重要為官經歷書於碑額者，如〈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漢故綏民校尉騎都尉桂陽曲紅灌陽長熊君之碑〉，分別參見王昶，《金石萃編》（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0，據掃葉山房本影印），卷一八，頁 4；洪适，《隸釋》（收入《隸釋·隸續》，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洪氏晦木齋刻本影印），卷一一，頁 17。但這些與繆宇官職稱謂中同時有「行事」和「守」的情況不同。

〈漢表〉和〈續漢志〉所載制度為據：郡太守之下有郡丞，王國相之下有長史；按漢制，官缺以職位低者權攝職位高者曰「行某事」。長史為六百石秩；不滿萬戶的小縣置長，為四百石至三百石秩。他的結論為：「墓主人繆宇不是彭城相，而是代理彭城相長史的呂縣縣長。」⁵ 毛遠明在彙編漢魏碑刻時採納了這個意見，他在注釋中指出：「繆宇以呂長，可代理彭城國相長史之職。」⁶ 于淼根據圖版釋讀出「要帶黑紬」中的「帶」字，並從漢代輿服等級制度出發，指出繆宇作為「呂守長」，其秩級不低於三、四百石。能夠「要帶黑紬」，說明繆宇實際上享受與「郡國長史」身分相當的待遇。這是很榮耀的事，所以要記錄在墓誌中。⁷

然發掘簡報的結論影響了學界大多數的研究者。查瑞珍在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授課講義《戰國秦漢考古》中，就墓誌萌芽階段舉例時，列舉了「江蘇邳縣彭城相繆宇墓石室石門上所刻的題記」。⁸ 日本學者西林昭一所編《新出土中國歷代書法》一書，在介紹〈繆宇墓畫像石題記〉時也徑用「其內容是頌贊彭城相兼呂縣守長繆宇的業績」。⁹ 李銀德在對徐州漢畫像石墓墓主身分作了全面排比後指出：「徐州畫像石墓墓主人的身份是封爵在列侯以下，俸秩在二千石以下的中下層官吏、商賈富紳以及較為貧困的平民，統治階級的上層如諸侯王、始封列侯、貴人、公主、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墓中不用畫像石。」但他仍然不顧上述結論，而是採納發掘者的意見，認為：「繆宇為彭城國相，秩二千石。」¹⁰ 周曉陸批駁宋治民意見，認為繆宇任彭城相領呂守長。¹¹ 由文物編輯委員會編輯的《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全面反映了這十年間全國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發現和研究成果，在對江蘇徐淮地區畫像石墓的舉例中，特別列出了「徐州彭城相繆宇墓」。¹² 黃曉芬也指出：「從玄室內出土的隨葬品及刻銘文字得知墓主人

⁵ 宋治民，〈繆宇不是彭城相〉，《文物》1985.1：83。

⁶ 毛遠明校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北京：線裝書局，2008），第1冊，頁172。

⁷ 于淼，〈繆宇墓誌中的「要帶黑紬」〉，《中華文史論叢》2015.4：120, 216。

⁸ 查瑞珍，《戰國秦漢考古》（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318。

⁹ 西林昭一編，陳滯冬譯，《新出土中國歷代書法》（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頁84。

¹⁰ 李銀德，〈徐州漢畫像石墓墓主身份考〉，《中原文物》1993.2：37。另有陳永清、井浩然的〈試論下邳在徐州漢文化中的地位〉一文，在涉及墓誌銘時，列舉了出土於下邳的「彭城相繆宇的墓誌銘」（徐州市兩漢文化研究會編，王中文主編，《兩漢文化研究：徐州市首屆兩漢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頁167。

¹¹ 周曉陸，〈繆紆墓誌讀考〉，《文物》1995.4：87。

¹²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110。

是東漢晚期的彭城相繆字。」¹³ 楊愛國在對漢代畫像石墓墓主身分進行分類時，也直接將繆字列為彭城相。¹⁴ 劉尊志在對徐州漢墓的專門研究中指出：「東漢時的彭城相繆字則是兼任呂守。」¹⁵ 黃宛峰認為繆字墓「文字確鑿，毫無疑問是二千石墓葬」。¹⁶ 專門研究徐州漢畫像石的武利華則作了折中考慮：「繆字原為彭城相，官秩二千石，去官後遇府召，再仕為行長史事呂守長，官秩六百石。」¹⁷

由以上引述可見，大部分學者依據發掘者的意見，認為繆字是二千石的彭城相，雖有部分學者指出繆字為呂守長行長史事，但並未得到學界重視。這是由於繆字擔任「呂守長」時的實際身分，學者若非徑稱為「呂縣縣長」，則是不加分析地引用為「呂守長」，並未作細緻考察，因而並不能很好地被大家接受。因此，考察繆字「彭城相行長史事呂守長」的真實職務，糾正一直以來的誤讀，便是本文重點。

二・東漢時代「行某事守某長／丞」史料疏證

關於「繆字墓誌」的命名，楊愛國準確指出是畫像石題記。¹⁸ 二〇〇六年，徐玉立根據徐州市漢畫像石博物館提供的清晰初拓本，對照發掘報告，指出題記文字「記彭城相繆字事，極類後世的『墓誌』」。他著錄時使用「邳州青龍山元嘉元年畫像石墓題記」為標題，而非「繆字墓誌」，以示與真正成熟的墓誌相區別。¹⁹ 下面主要據《漢碑全集》逐錄題記全文，個別文字據圖版改訂：

¹³ 黃曉芬，《漢墓的考古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3），頁194。

¹⁴ 楊愛國，《幽明兩界：紀年漢代畫像石研究》（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頁172。

¹⁵ 劉尊志，《徐州漢墓與漢代社會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134。「呂守」當是「呂守長」之誤。

¹⁶ 黃宛峰，《漢畫像石與漢代民間喪葬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138。

¹⁷ 武利華，《徐州漢畫像石通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頁349。他意識到了彭城相與呂守長之間的矛盾，故增加去官環節，但這是題記所無。另「呂守長」秩低於六百石。最近還有學者徑直將「彭城相繆字」用於論文標題，如劉禹彤，〈漢代彭城相繆字範圍解析〉，《園林》2019.8：22-26。

¹⁸ 楊愛國，《幽明兩界》，頁57。

¹⁹ 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第2冊，頁660。

故彭城相行長史事呂守長繆宇，字叔異。

巖巖繆君，體²⁰性純淑，信心堅明，□□□備，脩²¹京氏易，經□□□，恭儉禮讓，恩惠□□，□□告□，遠近敬赫。少秉□里，【前後²²】府召，退辟□□²³，執念閭巷。□相□□，□賢知命。復遇坐席，要帶²⁴黑紼。君以和平元年七月七日物故。元嘉元年三月廿日葬。

題記第一列文字清晰可讀，記錄繆宇的官職為「彭城相行長史事呂守長」，發掘簡報正是據此稱之為「彭城相繆宇」。然而，通讀題記全文，既沒看到他如何通過郡縣小吏成為地方長吏，也沒能看到他在「行長史事呂守長」時是何種職官，進而升遷為二千石之王國相的，這與東漢碑刻詳細記載墓主宦歷的情況有異。尤其是記繆宇去世前，還祇是「要帶黑紼」，即三、四百石的縣長或侯國相，或者六百石至千石的一般官吏，²⁵絕非二千石守相的「銀艾」

²⁰ 各種釋文均作「禮」。匿名審稿人指出，東漢常用「體性」，漢唐間多寫作「體」。細審圖版中此字左邊不從「示」，與〈裴君碑〉、〈樊敏碑〉「體」左邊相似，且洪适《隸釋》錄文中，〈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卷四，頁13）、〈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卷一，頁1）中均作「體性」。故此處當以「體」為是。感謝匿名審稿人教示！

²¹ 徐玉立，《漢碑全集》釋文作「循」。漢隸中「循」與「脩」字形相似，「京氏」二字清晰，據文意，應為「脩京氏易」。

²² 此前釋文均缺。然圖片中「府」上一字類「後」之右邊，查〈孔彪碑〉有「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徐玉立，《漢碑全集》第4冊，頁1379），與此處文義相合，故可補「前後」二字。

²³ 武利華釋作「呂守」，但圖版中二字殘缺，且文意不通，故不採。

²⁴ 簡報及《漢碑全集》均作「舞」，上引于淼文已指出為「帶」。

²⁵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點校本），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綬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頁743）衛宏《漢官舊儀》卷下：「三百石丞、縣長黃綬，皆大冠。……哀帝時，長相皆黑綬。」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49-50。班固與衛宏所記哀帝時縣長、侯相印綬制度稍有矛盾，但《漢書》卷八三〈朱博傳〉載朱博為冀州刺史時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頁3399）說明西漢後期實施過三、四百石「長、相黑綬」、「丞、尉黃綬」的制度是毫無疑問的。東漢制度，司馬彪《續漢書志》第三〇〈輿服下〉載：「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點校本），頁3675。說明東漢時期，從總體來說，二百石至四百石吏佩黃綬，但縣長、侯相實施的是佩黑綬的制度。《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載建武三年（27）秋七月詔：「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頁35）明確六百石之下的縣長、侯相為墨綬。〈馮緄碑〉載馮緄一生任職：「一要金紫、十

之符。²⁶ 因此，繆宇的職事應理解為「行彭城相長史事」。之所以不為「行彭城長史事」或「行彭城國長史事」，正如長沙東牌樓東漢簡中的「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封檢一樣，「桂陽大守行丞事」表示郡中太守府有丞，都尉府亦有丞。²⁷ 如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即記有：「太守吏員廿七人：大守一人，秩□□□□；大守丞一人，秩六百石；卒史九人，屬五人，書佐九人，用算佐一人，小府嗇夫一人。凡廿七人。都尉吏員十二人：都尉一人，秩真二千石；都尉丞一人，秩六百石；卒史二人，屬三人，書佐四人，用算佐一人。凡十二人。」²⁸ 《續漢書志》〈天文中〉記順帝永和三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²⁹ 文中明確了吳郡太守是王衡，羊珍是「吳郡太守行丞事」，與繆宇墓題記的表述完全一致。因而題記所示，繆宇祇是「行彭城相長史事」之職。

對於繆宇祇是以腰佩黑綬的身分行相府長史事，前引于淼文已經通過題記中的「要帶黑紼」指出。問題是「行長史事」後面還接有「呂守長」，而「呂守長」同樣非正式職官。秦漢時代的典籍和出土文獻表明，地方政府中「守官」「假官」和「行某官事」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前賢的研究均指向秦漢時代有臨時以本職「守某官」、「假某官」或「行某官事」的情況，均非固定職守。西漢後期至東漢前期的西北漢簡中存在很多相關實例，茲舉二例：

二銀艾、七墨綬。」（洪适，《隸釋》卷七，頁14）根據碑傳和史傳，他曾任職廣都長、武陽令、御史中丞、廷尉正、左監、治書侍御史、尚書，正好「七墨綬」；又歷任隴西太守、廣漢屬國都尉、遼東太守、廷尉、太常、將作大匠、河南尹、廷尉、屯騎校尉、廷尉，以及京兆尹、司隸校尉，從比二千石跨至中二千石，正好十二任二千石之職，即「十二銀艾」。可見廣都長屬於銅印黑綬之列。因而，東漢從制度規定和實際運作上，縣長、侯相均為黑綬。

²⁶ 范曄，《後漢書》卷六五〈張奐傳〉載張奐死前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章懷注云：「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頁2143）張奐表示他一生十次腰繫銀印艾綬，即曾十次任二千石之職。

²⁷ 孫聞博，〈說東牌樓漢簡《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緘》〉，《文物》2010.10：84-87。

²⁸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木牘二正，圖版頁14，釋文頁79。

²⁹ 范曄，《後漢書》，頁3245。校勘記指出〈順帝紀〉作「吳郡丞羊珍」，認為「太守」字當衍。（頁3253）從畫像題記可知，志文不誤，紀文乃簡省耳。

A. 第十守士吏李孝，今調守萬歲候長，有代罷。 (E.P.F22:256)

萬歲候長何憲，守卅井塞尉。 (E.P.F22:257)

建武五年四月丙午朔癸酉，甲渠守候謂第十守士吏孝。書到，聽書從事。如律令。 (E.P.F22:254A+255)

掾譚。 (E.P.F22:254B)³⁰

B. 地節五年正月丙子朔戊寅，肩水候房以私印行事，謂士吏平：候行塞，書到，平行候事。真官到，若有代，罷。如律令。

(73E.J.T21:42A+38A)

/ 令史拓、尉史義。 (73E.J.T21:38B)

印曰候房印。

正月戊寅，郭卒福以來。 (73E.J.T21:42B)³¹

文書 A 表示甲渠候官調守士吏李孝暫守萬歲候長，如有他人替代，李孝仍然要回去做守士吏。守士吏和守萬歲候長是兩種不同的代理職事，他並非同時代理此二種職事。文書 B 記肩水候房要巡行邊塞，暫時離開候官，臨時委派士吏平行候事，候房回來或有其他替代者，平所行職事自然廢止，仍然回去做士吏。東漢碑刻中也有以某職守他官的情況，如：

C. 〈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永初六年，青衣尉南安趙孟麟更易，由此道濱江，平澤無盜賊，差近廿里……維世青衣尉趙君，故治所書佐、郡督郵，隨牒除，到官六日，郡召守蜀鐵官長，積四月，治狀分明，徙守成都，今復還歸尉官。³²

碑文所載，是蜀郡青衣縣尉趙孟麟，接受任命到官不久，郡府就委任他代理鐵官長四個月，然後又讓他代理成都令。可能由於真正的成都令到官任職，他就回歸為本職青衣縣尉。繆宇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並非先已為「呂守長」，再「行長史事」，而是在為郡吏³³的時候被彭城相委派為「行長史事呂守長」。這個認識是

³⁰ 馬怡、張榮強主編，《居延新簡釋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頁 778-779。

³¹ 彩色圖版見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2），上冊，頁 29-30。

³² 洪适，《隸釋》卷四，頁 2-3。

³³ 本文所稱「郡吏」為郡國屬吏或郡國少吏。漢代碑刻文中均以「郡吏」為稱，如〈後漢田君碑〉記：「延熹二年辛亥詔書，泰山琅邪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惠公清撥煩整化者，試守滿歲為真，州言名。」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收入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編，《歷代碑誌叢書》第 1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據清槐廬叢書本影

從東漢官制和石刻文獻記載中得出來的。發掘簡報推測，按漢代歸葬故里的習俗，繆宇很可能是墓葬所在地武原縣人。³⁴ 這個推測當無問題。武原縣和呂縣均為彭城國屬縣，³⁵ 按照東漢地方官吏的籍貫限制，除京畿特制外，二百石以上的長吏原則上祇能用外郡人，百石以下的少吏原則上祇用本地人。³⁶ 繆宇所任職的「呂守長」，按職名可能存在兩種情況：一是中央任命的可以轉為真呂長的「試守」，一是郡太守任命的由少吏臨時代理呂長。³⁷ 試守可滿歲為真的「呂守長」是朝廷任命的長吏，祇能由外郡人擔任，繆宇為本郡人，因此他擔任的「呂守長」祇能是郡太守署任的臨時代理呂長。題記中繆宇沒有接受察舉為郎或任職公府的經歷，亦未有升遷為長吏的記載，在代理長吏時仍為少吏，正與漢制相合。³⁸

印），卷二，頁14。〈張遷碑〉記：「少為郡吏，隱練職位，常在股肱。」徐玉立，《漢碑全集》第5冊，頁1814。〈仙人唐君之碑〉有：「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徐玉立，《漢碑全集》第6冊，頁1995。

³⁴ 南京博物院、邳縣文化館，〈東漢彭城相繆宇墓〉，頁29。另外，青島土山屯墓群為漢代劉氏家族墓地，M147墓主劉賜任堂邑令，死後仍然歸葬故里的家族墓地。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黃島區博物館，〈山東青島土山屯墓群四號封土與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2019.3：405-459。

³⁵ 《續漢書志》第二一〈郡國三〉「彭城國」屬縣有「武原」、「呂縣」。又繆紆墓記有明確記載：「時皇漢之世，武原縣屬彭城。」李銀德、陳永清，〈東漢永壽元年徐州從事墓誌〉，《文物》1994.8：93-95。〈漢故廷尉仲君之碑〉載仲定宦歷有：「南陽陰府君察孝，不行。南郡胡公除濟陰，復舉孝廉，拜尚書左丞，除郎中，遷彭城呂長，徵試博士。」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309。

³⁶ 嚴耕望遍檢了東漢史籍和簡牘、碑刻中的郡縣吏籍貫，一直到東漢末年黃巾之亂前，籍貫限制是得到嚴格執行的。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修訂三版），頁349, 352。

³⁷ 參見武普照，〈秦漢守官制度考述〉，《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4：37-42；王剛，〈秦漢假官、守官問題考辨〉，《史林》2005.2：16-21。

³⁸ 班固，《漢書》卷九二〈游俠原涉傳〉載王莽時，茂陵邑門下掾王游公說守令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頁3718）明確顯示這位茂陵守令尹公是以京兆尹府吏為之，真令到官，他就得回歸為府吏。漢碑中所見的「守」，絕大部分也為太守所署的臨時代理。如〈漢孝廉柳敏碑〉載：「故孝廉柳君，諱敏，字愚卿。……君父以孝廉除郎中，□部府丞。君追祖繼體，歷職五官、功曹、守宕渠令。本初元年，太守蜀郡□君，復察舉君，□命失年。」（洪适，《隸釋》卷八，頁9）柳敏以功曹守宕渠令，後來以郡吏舉孝廉，可知其時仍為功曹身分，守宕渠令祇能是太守臨時任命。碑刻中惟一所見可「滿歲為真」的「試守」見於〈後漢田君碑〉：「為五官掾、功曹、州從事，辟太尉。延熹二年辛亥詔書，泰山琅邪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惠公清撥煩整化者，試守滿歲為真，州言名。時牧劉君，知君宿操，表上試守費。……故吏薛咸等立石勒銘。」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二，頁19。這次的試守明確是由皇帝任命的，且田君是時已為公府屬吏。

題記中有「府召」，說明繆宇被國相辟召為郡吏，因此他是以郡吏的身分被彭城國相任命為「呂守長」。佩帶長吏官印的「守長」雖僅為臨時職事，但對於少吏來說仍然是值得稱道和驕傲的事，因此繆宇墓室題記中要特別指出他「要帶黑紼」。同樣，曾以山陽郡功曹守金鄉縣長的侯成墓碑額也要特別題上「故金鄉守長」，³⁹ 靈帝熹平四年（175）牛公產的畫像題記也明確標上「園陽守令」，⁴⁰ 是為突出他們代理縣令長的經歷。

更重要的一點是，繆宇「行長史事呂守長」看起來是兩個不同的職務，但實際上並非為有時間先後、可分割的兩種職務，而是並列合起來為一種職事。要弄清這一點，需要分析漢代文獻中與之相同的表述，來理解這一制度。下面逐條分析同類文獻：

1. 〈故司隸校尉掾為楊君頌〉：「都督掾南鄭魏整字伯玉。」「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陽長。」⁴¹

此摩崖又名〈石門頌〉，是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48）漢中太守王升為頌揚司隸校尉楊孟文鑿通石門所作。頌文後部記有王太守派郡吏修復道橋、造作石積之事，郡吏魏整徙署之事附記於後。此摩崖頗為著名，自北宋以來，很多金石學家均有著錄或有語詞釋證，但基本不涉及魏整徙署之事的考證或解釋。據頌文所記，魏整為漢中郡南鄭縣人，任職本郡都督掾，由於修繕石門道橋有功，當天就被漢中太守王府君任命為「行丞事守安陽長」。李檣注曰：「此處言魏整以行郡丞事兼代安陽長。」⁴² 這一注釋乃不瞭解這種職官代理制度而造成的誤解。

魏整「行丞事守安陽長」，是王太守任命的臨時兼職，他的身分仍然是郡吏。按碑文「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陽長」，如果理解為兩個職務，則魏整在當日

³⁹ 侯成墓碑碑額為「漢故金鄉守長侯君之碑」（洪适，《隸釋》卷八，頁6），他的實際身分為州郡屬吏。

⁴⁰ 陝西離石馬茂莊牛公產墓門畫像題記為：「漢故西河園陽守令平周牛公產萬歲之宅兆。」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第5卷：陝西、山西漢畫像石，頁201。

⁴¹ 徐玉立，《漢碑全集》第2冊，頁570。為了便於行文和歸類分析，本文將「行某事守某長／丞」的同類文獻單獨分類標示為1-7，以與其他引證文獻相區別。

⁴² 李檣，《秦漢刻石選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162，注65。學界的研究表明，此處的「守」即為「代理」，而「行事」有時用「兼」，如居延漢簡237.25「關嗇夫王光，今調兼行候事□」，明確了王光以關嗇夫為本職，再兼行候事，參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頁87。故不能將「守安陽長」解釋為「兼代安陽長」。

若非到太守府「行丞事」，便要到安陽縣廷「守安陽長」，似不可兼顧。⁴³ 且魏整本為郡都督掾，辦公地點就在郡府，徙署郡太守府行丞事，祇需換房間辦公就可。因此，魏整「行丞事守安陽長」，並不會去到漢中郡的屬縣安陽，實際上是在太守府「行丞事」。那麼為何郡太守不讓魏整直接「行丞事」，而是要他「守安陽長」呢？〈孔耽碑〉中藏有這個問題的答案。

2. 〈漢故行梁相事碭孔君之神祠碑〉：「縣請署主簿、功曹，府招稽議，郡將烏程沈府君，表病委職，署君行事，假穀執長印黻，摠領文書年逾，皓首懸車家巷。」⁴⁴

據碑文，祠堂建成於光和五年（182）。孔耽為梁國碭縣人，曾為碭縣縣吏，後「府招稽議」，應是被梁相辟召為郡吏。梁國相沈府君是吳郡烏程縣人，由於生病，委請孔耽為「行事」。⁴⁵ 從碑額「行梁相事」可以推出，「署君行事」即讓孔耽「行梁國相事」。⁴⁶ 但孔耽行梁相事，沈太守並沒有將梁國相之二千石官

⁴³ 據《續漢書志》第二三〈郡國五〉，漢安陽縣故城，在今陝西城固縣北。則安陽縣城距漢中郡治南鄭縣有一定距離。參錢林書編著，《續漢書郡國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頁289。

⁴⁴ 洪适，《隸釋》卷五，頁5。〈續郡國志二〉「梁國」下作「穀熟」，王先謙《集解》引惠棟曰：「熟當作孰。」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4，據虛受堂刊本影印），頁1215上。本文均作「穀孰」。

⁴⁵ 范曄，《後漢書》卷四五〈韓稜傳〉載：「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頁1534）這是郡功曹在太守不能視事的情況下擅自代聽政事，與孔耽受委託行太守事稍有不同。然而，秦律令中有：「一歲病不視事盈三月以上者，皆免。」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遷吏令甲」，簡276/1865，頁190。《史記集解》引孟康語稱：「《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點校本修訂本），卷八，〈高祖本紀〉，頁437。表明秦漢律令規定官吏病滿三月不能治政理事，要免官，因此沈太守委任孔耽代行太守事一年多，實為違規之舉。

⁴⁶ 「行事」在漢碑中數見，〈漢樊穀修西嶽廟記〉和〈樊穀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均記弘農郡有「行事荀斑」（洪适，《隸釋》卷二，頁6）。〈三老趙寬碑〉記：「長子字子恭，為郡行事。」（徐玉立，《漢碑全集》第5冊，頁1645）高文以「從事」釋之。高文，《漢碑集釋（增訂本）》（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頁442，注六七。然「從事」乃「從事史」之簡稱，為州吏，此處明確為郡吏，故不確。從〈孔耽碑〉「署君行事」即「行梁相事」來看，荀斑和趙子恭可能是以郡吏行丞事。另一九九四年發現的徐州從事墓誌有：「君者諱紅，字季。為其徐州客郡位，周竟徐州從事，□長行事。」李銀德、陳永

印給予孔耽，祇是「假穀孰長印黻」，即讓郡吏孔耽「以穀孰長印行梁相文書事」。⁴⁷

「假穀孰長印黻」，表示梁國相沈府君讓孔耽「行梁相事」的同時「守穀孰長」，從而得以使用穀孰縣長的「墨綬銅印」，以縣官印行太守府文書事，並非表示孔耽從穀孰縣發出太守府的文書。從里耶秦簡來看，秦代就已經存在較多以低秩官印行高秩官府文書的現象，⁴⁸ 現舉一例典型文書如下：

D. 卅四年六月甲午朔乙卯，洞庭守禮謂遷陵丞：丞言徒隸不田，奏曰：司空厭等當坐，皆有它罪，耐為司寇。有書，書壬手。令曰：吏僕、養、走、工、組織、守府門、斂匠及它急事不可令田，六人予田徒四人。徒少及毋徒，薄移治虜御史，御史以均予。今遷陵廿五年為縣，廿九年田，廿六年盡廿八年當田，司空厭等失弗令田，弗令田即有徒而弗令田且徒少不傳於奏。及蒼梧為郡九歲乃往歲田。厭失，當坐論。即如前書律令。/ 七月甲子朔癸酉，洞庭段（假）守繹追遷陵。/ 歇手。• 以沅陽印行事。

七月甲子朔庚寅，洞庭守繹追遷陵：亟言。/ 歇手。• 以沅陽印行事。
/ 八月癸巳朔癸卯，洞庭段（假）守繹追遷陵，亟日夜上，勿留。/ 卯手。• 以沅陽印行事。/ 九月乙丑旦，郵人曼以來。/ 翥發。（正）

歇手。（背）(8-755+8-756+8-757+8-758+8-759+8-1523)⁴⁹

文書本來是秦始皇卅四年（前 213 年）六月二十二日由洞庭太守禮發給遷陵縣丞的，但郡府遲遲沒有收到遷陵縣的回覆，於是在太守不在署的情況下，讓繹臨時

清，〈東漢永壽元年徐州從事墓誌〉，頁 93-95。徐玉立據圖版重釋為：「君者諱紆，字季高，幼聲州署郡，仕周竟徐州從事，武原長行事。」徐玉立，《漢碑全集》第 3 冊，頁 774。繆紆應即為「行武原長事」。

⁴⁷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記載了永元十五年（103）「船師王皮」案，在文書處理環節有「長沙大守行文書事大守丞虞謂臨湘」。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發掘簡報〉，《文物》2013.6：22。此即「太守丞虞行長沙太守文書事」，與孔耽「以穀孰長印行梁相文書事」性質略同。

⁴⁸ 朱錦程對嶽麓秦簡 0371+0484+1046「郡官吏代理令」作了細緻研究。朱錦程，〈秦郡官吏代理制度考略〉，張德芳主編，《甘肅省第三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頁 395-405。

⁴⁹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 1 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頁 217, 348；陳垣昶，〈里耶秦簡 8-1523 編連和 5-1 句讀問題〉，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94，2013.01.08，讀取 2021.04.08)。

成為洞庭假守，「以沅陽印行太守事」，從七月十日至八月十一日，三次給遷陵縣發出追書。雖然追書封檢用的是沅陽令官印，但「洞庭假（假）守繹」的文書接在「洞庭太守禮」的文書後面作追書，說明追書是利用太守府留存的副本所作，均從洞庭太守府發出，因而「以沅陽印行事」祇能說明「洞庭假（假）守繹」以沅陽印行洞庭太守府文書事，並不表示洞庭假守繹從沅陽發出文書，也不能說明當時洞庭太守治所在沅陽。⁵⁰

漢代簡牘中多有以低秩官印行高秩官事的例子，汪桂海總結道：「二百石以上長吏若兼攝秩別比自己高的職官，代其行文書事，使用的官印也是其本任職官官印，不用（也未授予）所兼攝職官的官印。」⁵¹ 肩水金關漢簡有：「八月癸亥，宛獄守丞乘之兼行丞事，寫移武關。如律令。 / 掾弘、守令史林。（正）章曰宛獄丞印。（背）」(73E.J.T10:115)⁵² 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載：「郟吏員九十五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獄丞一人，秩二百石。」⁵³ 郟縣丞為四百石而獄丞為二百石，確知獄丞的祿秩等級低於縣丞。因此，宛獄守丞乘之「以宛獄丞印行宛丞事」，就是以低秩官印行丞事。

西北漢簡中還有以他官印行都尉文書事的例子，如居延新簡有：

⁵⁰ 洞庭郡治所在，是里耶秦簡公布後的熱點話題之一，許多學者根據文書的發出地推測秦洞庭郡治有過多次遷徙。游逸飛指出，僅憑文書發出地探討郡治所在，不夠穩妥。游逸飛，〈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戰國秦漢郡縣制個案研究之一〉，《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61（2015）：29-67，修訂稿發表於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16，2015.09.29，讀取 2021.04.08）。里耶秦簡中以洞庭假守的名義發出的文書中，除以洞庭郡屬官「洞庭司馬印」、「洞庭發弩印」等發出的以外，還有某年十月「以新武陵印行事」(7-11)（張春龍，〈里耶秦簡 7-1 和 7-11〉，發表於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等主辦，「首屆中日韓出土簡牘研究國際論壇暨第四屆簡帛學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19.09.06-08〕，頁 415）、廿七年十一月癸亥「以新武陵印行事」(9-23)、「以臨沅丞印副行事」(9-479)（陳偉主編，魯家亮、何有祖、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 2 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頁 35, 140），尤其是在同一份文書中，出現洞庭假守卅三年正月戊戌「以臨沅印行事」、二月甲子「以上衍印行事」(12-1784)（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上海：中西書局，2016〕，頁 135）。因此，通過「以某某印行事」來確定洞庭太守文書發出地為「某某縣」，應該是有問題的；而以這些文書來論證洞庭郡治在六、七年間曾三遷或四遷，也不是合適的思考方向。

⁵¹ 汪桂海，〈漢印制度雜考〉，《歷史研究》1997.3：87-88。

⁵²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上冊彩色圖版，頁 256。

⁵³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木簡二正，頁 79。

E. 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戊申，張掖居延城司馬武以近秩次行都尉文書事，以居延倉長印封，丞邨告勸農掾褒、史尚，謂官、縣：以令秋祠社稷，今擇吉日如牒。書到，令、丞循行，謹脩治社稷，令鮮明。令丞以下當侍祠者齋戒，務以謹敬鮮絜約省為故。褒、尚考察不以為意者，輒言如律令。掾陽、兼守屬習、書佐博。(E.P.F22:153+154)⁵⁴

居延城司馬武祿秩次於都尉，得以行其職事，但文書同樣是以居延倉長印封緘。

再回過頭來看孔耽。本來祇是郡吏的孔耽，被授權行梁相文書事，但不能使用梁相官印，在「假穀孰長印」後，就成了「行梁相事守穀孰長」，孔耽本人一直在梁相府寺之中處理文書事務。以孔耽名義發出的太守文書，封泥上祇能以穀孰長的官印為信，而且文書中要署明「以穀孰長印行事」。雖然孔耽代理梁相長達一年多，但仍然祇是臨時代理職事，孔耽的本職依然祇是郡功曹，既非穀孰長，更非梁國相。

按漢代制度，縣丞尉以上的長吏由朝廷任命，相應的印綬也應由朝廷授予。衛宏《漢舊儀》記載了朝廷拜授印綬的儀式：「拜御史大夫為丞相，左、右、前、後將軍贊，五官中郎將授印綬；拜左、右、前、後將軍為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贊，左、右中郎將授印綬；拜中二千石，中郎將贊，御史中丞授印綬；拜千石、六百石，御史中丞贊，侍御史授印綬。」⁵⁵ 引文呈現出朝廷拜授六百石以上吏的場面。漢宣帝黃龍元年夏四月詔書中有：「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⁵⁶ 或表示六百石以上的官印纔由中央朝廷頒授與收繳。⁵⁷ 那麼六百石以下的官印是不是由郡府頒授與收繳呢？嶽麓秦簡中有法令涉及官吏歸印制度：

F. ●令曰：吏有論貲（繫），二千石，治者輒言御史，御史遣御史與治者雜受印，在郡者，言郡守、郡監，守丞、尉丞與治者雜受印，以治所縣官令若丞印封印，令卒史上御史；千石到六百石，治者與治所縣令若丞雜受，以令若丞[雜]受，以令若丞印封，令吏上御史；五【百】以下印

⁵⁴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北京：中華書局，1994），下冊圖版，頁502-503。文本參馬怡、張榮強，《居延新簡釋校》，頁768。

⁵⁵ 孫星衍等，《漢官六種》，頁66。

⁵⁶ 班固，《漢書》卷八，〈宣帝紀〉，頁274。

⁵⁷ 秦漢時期六百石吏是高官與普通官吏的分界級，漢代稱六百石以上吏為長吏（大吏），要由代表皇帝的尚書選調。詳參楊振紅，〈秦漢官僚體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統及其意義——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社會構造研究之一〉，《文史哲》2008.5，後收入氏著，《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續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31-72。

行郡縣者，治者受印，以治□□所執灋；印不行郡縣及乘車吏以下，治者輒受，以治所令、丞印封印，令吏□□

(123/1174+124/1161+125/1151+126/1142)⁵⁸

從這條令文來看，二千石至六百石官印要上繳代表中央朝廷的御史，而五百石官印則祇要送到屬所執灋，毋需上繳至御史。這一制度影響到漢代，三、四百石低秩長、相的官印由郡國守相頒授與收繳，而郡丞或相國長史為六百石，官印需上繳至朝廷。〈漢故金鄉守長侯君之碑〉記載了侯成的宦歷：「郡請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金鄉長，即家假印綬。」⁵⁹ 山陽太守請郡吏侯成守金鄉縣長，派官吏直接到他家「假印綬」，說明金鄉長印綬本來就在太守府。因此，在穀孰長暫缺的情況下，穀孰長的官印存於梁相府，梁國相自然可以將穀孰長印綬假與孔耽。

從秦漢的官印上繳制度和孔耽的情況來看魏整，可知魏整雖受委派「行丞事」，但郡府並沒有「漢中太守丞」的官印，因而魏整需要「守安陽長」，纔有安陽長的「墨綬銅印」，方能「以安陽長印行太守丞事」，故「行丞事」與「守安陽長」必須同時存在，魏整方可有效行使漢中太守丞之職權。

有了這個認識再去看繆宇的「要帶黑紼」，就可知繆宇腰上所佩，是呂長的黑綬銅印，他雖「行長史事」，但並不會有彭城相長史的官印，而且也不會去呂縣上任，祇是以「呂守長」的身分使用呂縣縣長官印處理彭城國相府文書。這種現象在東漢墓畫像題記中尚有數例。

3. 陝西綏德蘇家圪坨楊孟元墓前室後壁中間立柱題記：「西河太守行長史事離石守長楊君孟元舍。永元八年三月廿一日作。」⁶⁰

據題記，楊孟元墓築於東漢和帝永元八年（96）。墓葬位於綏德縣城東南 35 公里處的無定河邊，墓室用長方形石塊砌成，分墓門、前室、過洞和後室，前室有覆斗狀的室頂，後室有三具棺木。在墓門上和前後室間的過洞外側有兩處畫像石，雕刻有樓房、飛禽瑞獸、車馬出行和樂舞、狩獵畫像。一九八三年發表的簡報並未就墓主的身分作出論斷。⁶¹ 但相鄰地點同時同類型的畫像石墓，發掘者推

⁵⁸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伍）》，頁 108-109。

⁵⁹ 洪适，《隸釋》卷八，頁 6。

⁶⁰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石全集》第 5 卷，頁 66-67。

⁶¹ 綏德縣博物館（吳蘭執筆），〈陝西綏德漢畫像石墓〉，《文物》1983.5：28-31。

測為地方官吏或地主富豪。⁶² 楊孟元能修建這麼大的畫像石墓，也應為地方官吏加富豪的身分。題記內容發表後，學界對楊孟元官職的認識，同樣存在分歧。鄭紅莉認為：「由題記知，墓主人楊孟元曾任西河郡太守。」並解釋道：「墓主楊孟元以西河太守身份代行長史之職，是以高秩代行低秩職官。」⁶³ 然孫聞博針對部分學者所謂兩漢「間有以高級官吏攝行低級官吏之事」的說法，指出兩漢時「行某官事」很少指稱「高級官吏攝行低級官吏之事者」。他指出「西河太守行長史事離石守長」的情況，是指「行丞事」者身分為縣令長，因某種需要行郡丞事。⁶⁴

裘錫圭也曾談及楊孟元的任職：「西河長史和離石長是兩個官職，楊孟元是与否就在守離石長的同時行西河長史事，從銘文尚無法肯定。」⁶⁵ 單從楊孟元墓題記確實無法得出是否同時任此二職。但綜合上引繆宇、魏整和孔耽的情況考慮，楊孟元也應是直接任職「行長史事離石守長」。楊孟元墓在綏德縣崔家鎮蘇家圪坨村，東漢時期為西河郡轄地，當屬蘭縣。按漢人歸葬故里的習俗，楊孟元或為西河郡蘭縣人。與繆宇一樣，楊孟元祇能在本郡做郡縣少吏，不得在本郡做長吏，其任職離石守長是郡府臨時任命的代理之「守」，而非中央任命的長吏之「試守」。因此可知楊孟元同樣是以郡吏的身分在郡守府「以離石長印行長史事」，裘先生認為刻石銘文無法確定西河郡治已經南遷離石，確為卓識。⁶⁶

4. 〈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⁶⁷

⁶² 米脂官莊四號畫像石墓有和帝「永初元年」的紀年，雕刻有樓房、瑞獸、車馬、弋獵、樂舞和牛耕畫像。簡報指出墓主為地主有閑階層。陝西省博物館、陝西省文管會寫作小組，〈米脂東漢畫象石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3：69-73。綏德延家岔畫像石墓，同樣繪有瑞獸、庭院、出行和狩獵題材的畫像，時間也在東漢章帝、和帝時期，墓主可能為地方官吏或一方富豪。戴應新、李仲煊，〈陝西綏德縣延家岔東漢畫像石墓〉，《考古》1983.3：233-237。

⁶³ 鄭紅莉，〈陝北東漢畫像石所見職官考述〉，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十一）》（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頁278-279。

⁶⁴ 孫聞博，〈說東牌樓漢簡《桂陽太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綬》〉，頁84-87。

⁶⁵ 裘錫圭，〈讀《陝西綏德縣四十里鋪畫像石墓調查簡報》小記〉，《考古與文物》2003.5，後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第3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頁329。

⁶⁶ 裘錫圭指出：「此時漢對匈奴，威勢方盛，似無將郡治南遷離石的必要。總之，如無其他證據，還不能輕易否定《後漢書》永和五年徙治離石的記載。」氏著，〈讀《陝西綏德縣四十里鋪畫像石墓調查簡報》小記〉，頁329。

⁶⁷ 徐玉立，《漢碑全集》第2冊，頁678。

永興為東漢桓帝年號，永興元年為一五三年。本碑是具體的文書實例。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漢制，王國相置長史一人，猶郡守之有丞也。卞為魯屬縣，故守長得上行長史事。其云守者，未正授之名也。」⁶⁸ 錢大昕認為擅首先是卞守長，然後上行長史事。然魯相為何在向司空府的上行文書中，以遠在他處的卞守長行長史事，而不直接用相府或魯縣其他相近秩次的官吏臨時代理相府長史的文書事務？如果對照上引諸人的情況，將「行長史事卞守長」看作一個職務，疑問就不會存在。可知魯相同樣是讓郡府小吏擅臨時守卞長，以卞長的官印行相府長史事，與魯相乙瑛一道向司徒、司空府呈上文書。

5.〈孔少垂墓碣〉：「□永壽元年乙未，青龍……孔子十九世孫□君……德施州里。朝廷……五官掾守長史兼行相事，所在□行。」⁶⁹

桓帝永壽元年為一五五年。趙明誠《金石錄》稱之為「漢孔君碣」，現藏曲阜孔廟漢魏碑刻陳列館。墓碣文字多風化而有不清晰者，但「五官掾守長史兼行相事」幾字，仍然清晰可讀，意思也非常清楚，孔君本為魯國五官掾，由魯相臨時委派為代理長史兼行魯相事，同樣為郡吏以長史印行魯相文書事務。

6.〈昭覺石表〉：「○光和四年正月甲午朔十三日丙午，越巂太守張勃、行丞事大祚守 / ○長常叩頭死罪敢言之。」「三月十三日丙午，越巂太守勃、行丞事大祚守長常叩頭死罪敢言之。」⁷⁰

此碑文字是將當時公文文書直接移錄刻在石表上，而且加上了簡牘文書中的「○」和「/」等標識符來表示起首、斷句和提行，因此〈昭覺石表〉是一份完整的公文文書。⁷¹ 與〈乙瑛碑〉一樣，越巂太守張勃在向上級回覆「庚子詔書」時，與「行丞事大祚守長常」共同簽署文書，彙報貫徹詔書的情況。東漢大祚為越巂郡屬縣，與郡治所在的邛都縣有相當遠的距離。很明顯，與繆宇、擅、楊孟元等人一樣，常代理的職事是「行丞事大祚守長」，也是作為郡吏「以大祚長印行越巂太守丞事」，在郡府處理郡丞的文書事務。

⁶⁸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據長沙龍氏家塾重刊本影印），卷一，頁11。

⁶⁹ 徐玉立，《漢碑全集》第3冊，頁757。

⁷⁰ 吉木布初、關榮華，〈四川昭覺縣發現東漢石表和石闕殘石〉，《考古》1987.5：434-437。

⁷¹ 伊強認為石表的文字內容由三部分組成，即「君教」批件、郡的回覆文書及另外一段不明性質的文字。伊強，〈《光和四年石表》文字考釋及文書構成〉，《四川文物》2017.3：47-54。

7.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 001：「臨湘丞掾驛馬行。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⁷²

與上引材料皆為碑文不同，這是一枚文書封檢木牘，代表了文書所用官印的實例。封檢中間用大字寫明收件方為「臨湘丞掾」，傳送方式為「驛馬行」。封檢右側小字是收件人寫上去的，表明發件人職官為「桂陽大守行丞事」，封緘官印為「南平丞印」。南平並非桂陽郡治，「行丞事」的官吏沒有郡丞之印，祇能假以「南平丞印」發出郡府文書。⁷³ 南平遠在郡城之外，參考上引文獻可知，「行丞事」者很可能不是「南平丞」的實職，同樣是以郡吏「行丞事守南平丞」，因而得「以南平丞印行桂陽大守丞事」，簽發桂陽郡文書。

東牌樓東漢簡牘文書中多有年號記錄，均為漢靈帝時期。最早為建寧四年(171)，最晚為中平三年(186)，因此本封檢年代很可能也為靈帝時期。⁷⁴

將上述 7 條材料與本文所討論的繆宇這一條按年代先後製成表格，大體上可以看出一點規律：

表一

年代	姓名	行事	本職	籍貫
永元八年 (96)	楊孟元	西河大守行長史事離石守長	郡吏	本郡
建和二年 (148)	魏整	漢中太守行丞事守安陽長	郡都督掾	南鄭
元嘉元年 (151)	繆宇	彭城相行長史事呂守長	郡吏	武原
永興元年 (153)	擅	魯相行長史事卞守長	郡吏？	
永壽元年 (155)	孔少垂	守長史兼行魯相事	五官掾	曲阜
光和四年 (181)	常	越巂太守行丞事大茆守長	郡吏？	
光和五年 (182)	孔耽	行梁相事，假穀孰長印黻	郡吏	碭
靈帝時期 (171-186)		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	郡吏？	

⁷²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圖版見頁 11，釋文見頁 71。封檢左上有殘，但根據殘存筆劃，可明確知道是「臨湘」二字。

⁷³ 參孫聞博，〈說東牌樓漢簡《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緘》〉，頁 84-87。

⁷⁴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東牌樓七號井發掘報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頁 28。

這些材料涉及從和帝至靈帝的東漢中後期，既有事後對官吏任職的追記，又有事件當時的臨時任命；不僅有文書的內容，還有用印的記錄；分布地域覆蓋了除北方長城沿線和嶺南以外的廣大地區，因而上述材料數量雖然不多，但具有較大的普遍意義。從墓主的籍貫和任職情況來看，8 人中有 5 人明確知道為本郡郡吏，2 人極可能為郡吏，另 1 人也可能為郡吏；有 5 人為守長行郡丞（或郡國長史）事，1 人為守縣丞行郡丞事，1 人為守縣長行相事，1 人為守長史行相事。從職事的表述來看，除孔少垂將守職列於行事之前外，其他均是「行高秩官事」在前，「守低秩官」在後，體現的是郡吏受委派以某一低秩官印行高秩官職事的特殊代理情形。「行梁相事」的郡吏孔耽有穀孰長印綬，而「桂陽大守行丞事」者則以「南平丞印」簽發文書。可以推知，郡太守或王國相可以臨時任命郡吏以「守縣長／縣丞」的身分，假與長／丞的官印，行郡丞（或郡國長史）的文書事務，甚至可以授權郡吏臨時代理郡守（或王國相）之事務，職事的重點是所行機構的文書事務，故「行事」列於前而「守」置於後。但是行事者的身分仍然為郡吏，祇是郡吏有了「守某長／丞」的身分，可以實實在在佩帶縣長／丞的官印，在守官期間就有了長吏的名義。繆宇題記強調「要帶黑紬」，就是記載了他佩帶呂縣縣長官印這一事實。

需要強調的是，郡都督掾魏整是「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陽長」，說明「行某事守某長／丞」是不可分割的職務名稱，「行」與「守」代表的是這個職事的兩個方面：用守官之印信行高秩官吏之職事。實際上「行丞／長史／相事守某長」的官吏完全不在所「守」之縣，而是在郡府（或相府）行事，簽署的文書也是從郡府（或相府）發出，因而以某縣官印行事來定位文書的發出地，顯然不是正確的思考路徑。

三・郡國守相與地方大姓士族的利益關係

為何當時的郡國守相要以這種迂曲的方式讓一位郡吏代行郡國長吏之職權呢？前文指出低秩長相職位空缺時，官印繳存於郡國守相府，是主官得以委派郡吏守職行事的前提。但更重要的是，守相選擇代行長吏職事的郡吏，並非一般僚屬，而是主官信得過的親近吏。這是主官賴以治民行政的重要舉措。但這種「親近吏」，在兩漢時代是有著變化的。侯旭東利用肩水金關漢簡研究肩水候時發現，西漢後期的西北邊塞，代行候事者並非根據秩次，亦不考慮工作地點的便

利，而是選擇信任與親近的小吏。⁷⁵ 他進而指出，在西漢推行察舉的時代，府主與屬吏之間的關係變得功利，成為一件值得經營的事，郡將與受信任的郡吏之間就可以構建一種親近的「信—任」型上下關係。對於小吏而言，努力與府主形成親近關係，更容易得到晉升的機會，等於加大了私人關係在仕途上的權重。在這種關係中，府主居於相對主導地位。⁷⁶ 而東漢時代，陳直根據望都漢墓壁畫榜題中的「門下」諸吏指出，東漢的「門下五吏」，尤其是功曹與主簿，是太守最親信之僚屬，出則導車從，入則參機要。⁷⁷ 然筆者曾指出，與郡縣主官私的性質較濃的親近吏乃因人而異，並非在制度上有何種小吏必為親近吏的規定。⁷⁸ 前引東漢中後期郡國守相委派行事的郡吏，體現了守相對他們的親近與信任，8 例中祇有 2 人明確標出為都督掾和五官掾，而這兩個職官都非「門下吏」。

前賢研究表明，東漢中後期這種主官與下屬之間親近的私人關係，更多情況下祇能在主官與當地大姓士族中產生，原因為東漢時期地方家族勢力的發展。唐長孺指出，由於大姓士族、豪強勢力的發展，州郡進用「衣冠子弟」是通例，他們任職州郡僚佐是理所當然，不會感謝進用他們的長官。⁷⁹ 這就意味著郡縣主官與僚屬的關係發生了變化。漢碑中那些「州里歸稱」、⁸⁰「名寶鄉黨」、⁸¹「鄉黨所稱」、⁸²「鄉黨見歸」⁸³ 等描述個人聲望的文字，多為形容有地方影響力的大

⁷⁵ 侯旭東，〈西漢張掖郡肩水候繫年初編——兼論候行塞時的人事安排與用印〉，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甘肅簡牘博物館編，《簡牘學研究》第 5 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4），頁 180-198。

⁷⁶ 侯旭東，《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頁 174-194, 214。

⁷⁷ 陳直，〈望都漢墓壁畫題字通釋〉，氏著，《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 464-465。

⁷⁸ 參鄒水杰，〈簡牘所見秦漢縣屬吏設置及演變〉，《中國史研究》2007.3，後收入氏著，《兩漢縣行政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頁 106-110。

⁷⁹ 唐長孺指出：「各級地方行政機構通常是由地方大姓中代表人物組成的。」「州郡大吏照例由大姓、冠族充當，而大姓冠族每郡祇此數姓，因而州郡大吏就帶有世襲性。……地方各級長官有任期，而地方僚佐多世襲，我們認為東漢時期的地方政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當地大姓、冠族控制的。」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25-27。

⁸⁰ 洪适，《隸釋》卷九，〈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頁 4。

⁸¹ 洪适，《隸釋》卷五，〈漢故葭長蔡君之頌〉，頁 1。

⁸² 宋治民，〈都江堰渠首新出土漢碑及相關問題〉，《四川文物》2007.4：47。

⁸³ 洪适，《隸釋》卷一一，〈漢故領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頁 9。

姓士族子弟。前述諸人中，孔耽「馨卓流布」，⁸⁴ 孔少垂「德施州里」，⁸⁵ 雖所記文字有諛墓之嫌，但庶幾代表了當時輿論對於士族子弟的評價導向，他們在鄉里施德，從而廣有聲望。因此，主官與屬吏之間發展私人關係，對於郡吏而言，固然是為了得到掌握實權和晉升的機會，而對於來自外地的郡國守相來說，則是為了倚重當地大姓士族的地位或名望來實現對郡國的治理。史載東漢中期郡國主官委政於大姓士族出身的郡吏，自己祇要「奉宣詔書而已」。⁸⁶ 東漢後期出現的郡太守「但坐嘯」、「主畫諾」的謠諺，⁸⁷ 也是在這個背景之下產生的。因此，不僅地方小吏要努力經營成為府主親信，守相也要與地方大姓士族結好，故雙方都會重視和經營這種相互為用的利益關係。

前引陝西綏德楊孟元墓及周邊大型畫像石墓大抵建成於東漢章帝、和帝時期，畫像上有車馬出行、樂舞、庭院、狩獵等形象，發掘者推測這些墓主可能為地方官吏或一方富豪。⁸⁸ 楊孟元是以郡吏的身分成為「西河太守行長史事離石守

⁸⁴ 洪适，《隸釋》卷五，頁5。

⁸⁵ 徐玉立，《漢碑全集》第3冊，頁757。

⁸⁶ 范曄，《後漢書》卷七六〈循吏王渙傳〉載廣漢太守回答和帝之語：「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頁2468）王渙為安定太守王順之子，從任俠少年轉習儒學、讀律令後成為郡吏，直到太守陳寵入為大司農，應對和帝之問方才「顯名」。鐔顯未明出身，〈陳寵傳〉載其為「良吏」（頁1553），「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並最終官至「長樂衛尉」（頁2470），其出身當亦不低。至於更晚時代的漢末名士，唐長孺列舉分析了東漢後期名士「出於大姓、冠族的恐怕要佔頗大的比例」，像陳寔、郭泰那類出自貧賤的畢竟是少數。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頁28-29。

⁸⁷ 范曄，《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頁2186）范滂、岑暉雖有學問有幹才，但范滂為龍舒侯相之子（《後漢書》卷六七，注引《謝承書》，頁2207），岑暉之父岑豫曾任南郡太守（頁2212），他們均出身大姓官貴之家，又有高名，太守可以借其勢「振威嚴」。關於「畫諾」，陳松長、周海鋒指出東漢「君教」簡上的「諾」是縣長吏同意或認可的簽署。陳松長、周海鋒，〈「君教諾」考論〉，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325-330。邢義田利用新出五一廣場東漢簡和長沙吳簡指出，「畫諾」與「簽署」是不相同的兩回事，「畫諾」表示長官同意僚屬之所擬或所為，「簽署」或「署名」比較多地表示對文書內容和作業流程負責。邢義田，〈漢晉公文書上的「君教『諾』」、署名和畫諾——讀《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札記〉，氏著，《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313-329。

⁸⁸ 陝西省博物館、陝西省文管會寫作小組，〈米脂東漢畫象石墓發掘簡報〉，頁69-73；戴應新、李仲煊，〈陝西綏德縣延家岔東漢畫像石墓〉，頁233-237；綏德縣博物館，〈陝西綏德漢畫像石墓〉，頁28-31。

長」，楊氏當為西河郡有財富、有地位、有聲望的大姓士族，而非僅僅是一般富豪，因而郡太守選擇楊孟元以郡吏身分代行長史事。繆宇於桓帝和平元年（150）去世，此時，由於桓帝即位所形成的甘陵南北部對立剛剛發生，⁸⁹ 清流名士方始出現，⁹⁰ 很難說名士風尚在彭城之地形成了廣泛的輿論影響。因而在繆宇任職的時代，彭城相能夠依倚的更多是地方士族勢力。從繆宇墓規模及賓主對弈、樂舞、弋射、宴飲、狩獵、車馬出行、祥瑞等畫像題材來看，繆宇家族應該就是彭城相也要倚重的大姓士族之一。繆宇墓雖然局部結構有毀損，但殘存有墓垣，墓園總面積約 250 平方公尺，墓室由前後兩室和繞後室而設的迴廊三部分組成，墓中畫像描繪了繆宇生前的奢侈生活以及死後祭祀的場面。發掘者因此認為，即使作為二千石官吏的墓葬，繆宇墓也有明顯的僭制。⁹¹ 但更多考古資料表明，蘇皖地區的官吏墓葬從西漢到東漢均有發現墓垣建築的現象；而在洛陽地區的官吏墓葬中，東漢中期就已出現多室墓，且墓室結構有向複雜發展的趨勢。⁹² 安徽宿縣褚蘭胡元王墓地上有祠堂、墓園，地下墓室建有前後室及左右側室，祠堂和墓室刻有精細考究的壁畫，但建寧四年（171）胡元王墓碑中卻並無他任職官吏的任何記載，因此，發掘者認為胡元王很可能是當時郡縣中的富豪之輩。⁹³ 劉尊志在對比了徐州不同類型的漢墓葬制後指出：「徐州地區的東漢諸侯王墓一般為磚石混築或磚室，有前後室，多有耳室，墓葬規模雖較一般墓葬大，但與一些貴族、官吏的大型石室墓等相比，差別很小。另一方面，有些豪強地主或中下層官吏卻使

⁸⁹ 范曄，《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序〉，頁 2185-2186。

⁹⁰ 川勝義雄著，徐谷芄、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6-7。胡寶國指出，順帝以後，汝潁地區湧現了一批名士，參〈漢晉之際的汝潁名士〉，《歷史研究》1991.5，後收入氏著，《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 21-29。劉蓉認為東漢名士階層的形成始於桓帝即位後的李杜事件，見氏著，《漢魏名士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27-44。

⁹¹ 南京博物院、邳縣文化館，〈東漢彭城相繆宇墓〉，頁 28-29。劉振東就直接將其列入二千石官吏的墓葬來考察。劉振東，〈漢代二千石官吏墓的發現與初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漢代城市和聚落考古與漢文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 250-259。

⁹²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分別見於頁 453, 400。

⁹³ 此墓碑較小，文字漫漶，不能通讀。額題七字分三行：「辟陽胡元王□墓。」碑額和碑文中皆未提及他有任官晉爵的經歷，可能他生前確實未作過官吏。畫像中的車馬儀仗和享樂生活，是為亡靈安排在另外一個世界的理想生活。王步毅，〈安徽宿縣褚蘭漢畫像石墓〉，《考古學報》1993.4：515-548。

用了諸侯王、貴族的某些葬制。」⁹⁴ 從地方大姓士族的角度來說，繆宇墓的葬制算不上「僭制」，而是東漢士族重視世俗生活在喪葬觀念上的體現。

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邳州燕子埠又發現了永壽元年（155）徐州從事繆紆墓及門楣畫像題記。⁹⁵ 繆宇和繆紆的墓葬規模相當，兩墓相隔僅 120 公尺；根據題記的紀年，二人去世時間祇相差 5 年；兩墓內均在前室右側放置尺寸大致相同的石祭案，題記刊刻位置都在墓門門額正中偏右位置；繆宇為郡吏「行長史事呂守長」，繆紆任職「徐州從事武原長行事」；且繆宇的「宇」「从宀于聲」，繆紆的「紆」「从糸于聲」，名字聲部相同。這些跡象表明，二者大概率為同一宗族之人。燕子埠所在的青龍山周圍漢墓眾多，繆紆之父亦遷葬於此，因此學者推測邳州青龍山為繆氏家族墓地。⁹⁶

日本學者東晉次認為東漢地方豪族之間存在等級差異，即根據能夠出任郡吏和祇能供職縣廷的差別，可以區分為士大夫豪族和非士大夫豪族。⁹⁷ 繆宇和繆紆二人或「少秉□里」，或「幼聲州署郡」，後均任職州郡吏，顯示二人並非是影響力侷限於縣中的士人；繆宇「脩《京氏易》」，繆紆墓記中強調「學問」、「不忘《春秋》之義」，說明繆氏是當地傳習儒家經學的士大夫豪族，是文化士族。⁹⁸ 雖然兩處題記說他們「恭儉禮讓」、「性清儉醇」，但他們的墓葬奢華講究，一方面反映了東漢時代徐州地區經濟文化的繁榮，另一方面顯現出繆氏家族的地位與財力。繆紆墓題記且明確記載「君父關內侯」，⁹⁹ 顯然繆氏是當地大姓

⁹⁴ 劉尊志，《徐州漢墓與漢代社會研究》，頁 128。

⁹⁵ 李銀德、陳永清，〈東漢永壽元年徐州從事墓誌〉，頁 93-95；〈邳州燕子埠永壽元年畫像石墓記〉，見徐玉立，《漢碑全集》第 3 冊，頁 774。

⁹⁶ 周曉陸在釋讀二處畫像題記後，也認同邳州青龍山墓地為繆氏家族墓地。周曉陸，〈繆紆墓誌讀考〉，頁 86-87。另米脂官莊 4 座畫像石墓畫像風格相似，且一、二、四號墓的前室均合葬二人，學者認為應是家族基地的二次遷葬。戴應新、李仲煊，〈陝西綏德縣延安岔東漢畫像石墓〉，頁 237。

⁹⁷ 東晉次，〈後漢的選舉與地方社會〉，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上古秦漢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572。

⁹⁸ 劉萃峰根據《史記·儒林列傳》中的「蘭陵繆生」和魏晉時期繆襲父子的記載，認為繆宇和繆紆是東海郡蘭陵人。劉萃峰，〈漢晉之際的東海繆氏〉，《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20.05.28。然繆宇和繆紆墓題記明確了他們是在彭城國任職郡吏，繆紆墓記還特別註明「武原縣屬彭城」，因而他們祇能是彭城國人，並非東海郡人。

⁹⁹ 范曄，《後漢書》卷五〈孝安帝紀〉載永初三年三月：「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頁 213）繆紆墓題記不載其父官職，祇記其爵為「關內侯」，不排除其高爵為入錢穀所得。

士族之家。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¹⁰⁰ 孟子之時，巨室調列國大夫之家，而東漢中後期之郡國，巨室即郡內大姓士族。繆宇生活的順帝至桓帝初期，由外地前來彭城任職的二千石國相，¹⁰¹ 需要借助當地大姓士族的聲望來實施地方治理，¹⁰² 繆宇家族作為當地富有財力和聲望的儒學士大夫家族，與國相發展了私人關係，取得了國相的信任，他因而能夠以郡吏的身分行長史事，成為國相事實上的副手。繆紆從郡吏至州從事，並為「武原長行事」，且「凡四佩黑綬」，¹⁰³ 多次以州郡吏行縣長吏之職權。二人都能以州郡少吏行郡縣長吏事，表明他們並非一般僚屬，應是與彭城國相有相當好的私人關係纔能達成。彭城國相在短期內先後選擇兩位燕子埠一帶的繆姓士人出任僚屬，並非僅僅看中他們的學識與才能，而是因為他們大姓士族的身分和在當地社會中「遠近敬鄉」的聲望，能夠佐助國相行政治民。東漢中後期這種地方主官與僚屬之間相互為用的利益關係，與西漢郡吏受重視更多來自於主官單方面的「寵」與「信」，有著很大的不同。

四・結語

綜上所述，東漢繆宇墓畫像石題記載其任職「彭城相行長史事呂守長」，並非表示繆宇為彭城相。通過與 7 例同類型東漢中後期文獻比較可知，繆宇實為彭城國屬吏之身分，曾受彭城相委派臨時擔任「行長史事呂守長」，以呂縣縣長官印行相府長史職事。「呂守長」表示他佩有呂長的「墨綬銅印」，可以「要帶黑紼」；「行長史事」表示他代理長史行事，可以處理相府文書。「行長史事呂守長」屬於一個職事的兩個方面，兩者不可分割。

¹⁰⁰ 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7），〈離婁章句上〉，頁 531。

¹⁰¹ 據嚴耕望《兩漢太守刺史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頁 173，順桓之世見於記載的彭城相僅有袁賀，汝南汝陽人。資料見於范曄，《後漢書》卷四五，〈袁閎傳〉，頁 1525；卷四八，〈應奉傳〉注引《謝承書》，頁 1607。

¹⁰² 當然，東漢時期也有出身貧賤者，如陳寔，因為有志好學又有德操，成為郡功曹，又由「天下服其德」而為司空辟選。范曄，《後漢書》卷六二，〈陳寔列傳〉，頁 2065。但陳寔等人之任職乃於東漢後期清流輿論與名士階層形成之後，且是為數很少的個例。

¹⁰³ 李銀德、陳永清釋為「民四佩里歿」，周曉陸釋「民四假望歿」，徐玉立釋讀為「凡四假望歿」，均不成文。因後文有「遭疾終卒」，「年七十一」前不當有「歿」字，且漢石中尚無「歿年幾十幾」的寫法。細審圖版，可能是「凡四佩黑綬」，文意既通，亦符合東漢墓記的書寫習慣，表示繆紆有過四次守縣令長的經歷。

秦漢時代以低秩官印行高秩官職文書事務屬於常見的現象，但用某縣官印行郡府文書並不表示文書從那個縣發出。如里耶秦簡洞庭太守府文書「以沅陽印行事」、「以新武陵印行事」等，並不表示郡府文書是從沅陽縣廷或新武陵縣廷發出，更不能由此得出洞庭郡曾徙治於這些縣城。孔耽受委派以穀孰長官印行梁相文書一年多，但他一直是在相府發出文書；以「南平丞印」封緘發出的桂陽郡文書，祇能是從郡府發出的。楊孟元在永元八年之前作為「西河大守行長史事離石守長」，同樣不能認定西河郡治此前已經遷往離石。繆宇雖為「呂守長」，用呂縣縣長官印發出彭城相府文書，但他實際上一直是在相府辦公。

東漢中後期地方大姓士族勢力有發展的需求，一方面要治經學形成為文化士族，另一方面也要尋求在州郡任職，取得名望與對於地方的領導權，需要著力經營與主官的關係，取得主官的信任。而外地前來任職的郡國主官，需要在有限的任期內取得較好的政績，也需要倚重有地位、有名望的地方大姓士族。處於繆氏家族墓地的繆宇墓和繆紆墓規模較大，都有石刻畫像和題記，二人年少時即享有聲望，均有經學修養，同樣由州郡少吏行長吏事，繆紆之父甚至爵至關內侯，表明彭城繆氏是當地的大姓士族，與彭城相有著良好的私人關係，而繆氏也是彭城相需要倚重的地方士族勢力。而對於郡吏中寵為親信的士族子弟，守相通過委派他們以「守縣長吏」的身分行郡國文書事務，就能很快理順政府與士族社會的關係，因而東漢中後期地方以郡國少吏「行丞／長史事守某長」也就成了較為合適的行政運作模式，而地方主官但「奉宣詔書而已」，甚至祇要「畫諾」「坐嘯」，雖然不能因此認為東漢國家受到豪族支配，但的確體現了東漢中後期郡縣權力對地方大姓士族勢力的某種妥協。¹⁰⁴

（本文於民國一一〇年四月十五日收稿；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通過刊登）

¹⁰⁴ 西嶋定生指出東漢國家是一個豪族聯合政權形態。西嶋定生，〈古代国家の権力構造〉，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頁 333-334。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4，據虛受堂刊本影印。
- 王昶，《金石萃編》，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0，據掃葉山房本影印。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點校本修訂本。
- 洪适，《隸釋》，收入《隸釋·隸續》，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洪氏晦木齋刻本影印。
-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點校本。
- 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點校本。
- 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7。
- 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
-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收入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編，《歷代碑誌叢書》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據清槐廬叢書本影印。
-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據長沙龍氏家塾重刊本影印。
- 錢林書編著，《續漢書郡國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二・考古資料與出土文獻

-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第5卷：陝西、山西漢畫像石。
-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毛遠明校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北京：線裝書局，2008。
- 王步毅，〈安徽宿縣褚蘭漢畫像石墓〉，《考古學報》1993.4：515-548。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北京：中華書局，1994。
-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
-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2。
- 吉木布初、關榮華，〈四川昭覺縣發現東漢石表 and 石闕殘石〉，《考古》1987.5：434-437。

鄒水杰

- 西林昭一編，陳滯冬譯，《新出土中國歷代書法》，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
- 宋治民，〈都江堰渠首新出土漢碑及相關問題〉，《四川文物》2007.4：47-51。
- 李銀德、陳永清，〈東漢永壽元年徐州從事墓誌〉，《文物》1994.8：93-95。
- 李檣，《秦漢刻石選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上海：中西書局，2016。
-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發掘簡報〉，《文物》2013.6：4-25。
-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黃島區博物館，〈山東青島土山屯墓群四號封土與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2019.3：405-459。
- 南京博物院、邳縣文化館，〈東漢彭城相繆宇墓〉，《文物》1984.8：22-29。
- 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
- 陝西省博物館、陝西省文管會寫作小組，〈米脂東漢畫象石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3：69-73。
- 馬怡、張榮強主編，《居延新簡釋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 高文，《漢碑集釋（增訂本）》，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 張春龍，〈里耶秦簡 7-1 和 7-11〉，發表於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等主辦，「首屆中日韓出土簡牘研究國際論壇暨第四屆簡帛學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19.09.06-08。
-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
-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
-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 1 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 陳偉主編，魯家亮、何有祖、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 2 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
- 綏德縣博物館，〈陝西綏德漢畫像石墓〉，《文物》1983.5：28-31。
- 戴應新、李仲煊，〈陝西綏德縣延家岔東漢畫像石墓〉，《考古》1983.3：233-237。
-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

三・近人論著

于淼

- 2015 〈繆宇墓誌中的「要帶黑紬」〉，《中華文史論叢》2015.4：120, 216。

川勝義雄著，徐谷芑、李濟滄譯

- 2007 《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 2010 《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剛

- 2005 〈秦漢假官、守官問題考辨〉，《史林》2005.2：16-21。

王偉

- 2018 〈秦代守官、假官制度考論〉，陳松長等，《秦代官制考論》，上海：中西書局，頁 112-137。

伊強

- 2017 〈《光和四年石表》文字考釋及文書構成〉，《四川文物》2017.3：47-54。

朱錦程

- 2017 〈秦郡官吏代理制度考略〉，張德芳主編，《甘肅省第三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頁 395-405。

宋治民

- 1985 〈繆宇不是彭城相〉，《文物》1985.1：83。

李銀德

- 1993 〈徐州漢畫像石墓墓主身份考〉，《中原文物》1993.2：36-39。

汪桂海

- 1997 〈漢印制度雜考〉，《歷史研究》1997.3：82-91。

邢義田

- 2019 〈漢晉公文書上的「君教『諾』」、署名和畫諾——讀《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札記〉，氏著，《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上海：中西書局，頁 313-329。

周曉陸

- 1995 〈繆紆墓誌讀考〉，《文物》1995.4：83-87。

東晉次

- 1995 〈後漢的選舉與地方社會〉，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上古秦漢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572-601。

鄒水杰

武利華

2017 《徐州漢畫像石通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武普照

1988 〈秦漢守官制度考述〉，《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4：37-42。

侯旭東

2014 〈西漢張掖郡肩水候繫年初編——兼論候行塞時的人事安排與用印〉，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甘肅簡牘博物館編，《簡牘學研究》第5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頁180-198。

2018 《寵：信一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查瑞珍

1990 《戰國秦漢考古》，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胡寶國

2020 〈漢晉之際的汝潁名士〉，《歷史研究》1991.5。後收入氏著，《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20-43。

唐長孺

1983 〈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頁25-52。

孫聞博

2010 〈說東牌樓漢簡《桂陽太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緘》〉，《文物》2010.10：84-87。

高震寰

2015 〈試論秦漢簡牘中「守」、「假」、「行」〉，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4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58-79。

陳永清、井浩然

1996 〈試論下邳在徐州漢文化中的地位〉，徐州市兩漢文化研究會編，王中文主編，《兩漢文化研究：徐州市首屆兩漢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頁165-168。

陳松長、周海鋒

2015 〈「君教諾」考論〉，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頁325-330。

陳直

1988 〈望都漢墓壁畫題字通釋〉，氏著，《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頁463-471。

游逸飛

- 2015 〈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戰國秦漢郡縣制個案研究之一〉，《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61：29-67。修訂稿發表於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16，2015.09.29，讀取2021.04.08。

黃宛峰

- 2015 《漢畫像石與漢代民間喪葬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黃曉芬

- 2003 《漢墓的考古學研究》，長沙：嶽麓書社。

楊振紅

- 2015 〈秦漢官僚體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統及其意義——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社會構造研究之一〉，《文史哲》2008.5。後收入氏著，《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續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31-72。

楊愛國

- 2006 《幽明兩界：紀年漢代畫像石研究》，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裘錫圭

- 2012 〈讀《陝西綏德縣四十里鋪畫像石墓調查簡報》小記〉，《考古與文物》2003.5。後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第3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頁326-329。

鄒水杰

- 2008 〈簡牘所見秦漢縣屬吏設置及演變〉，《中國史研究》2007.3。後收入氏著，《兩漢縣行政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頁81-111。

劉禹彤

- 2019 〈漢代彭城相繆宇苑囿解析〉，《園林》2019.8：22-26。

劉振東

- 2012 〈漢代二千石官吏墓的發現與初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漢代城市和聚落考古與漢文化》，北京：科學出版社，頁250-259。

劉尊志

- 2011 《徐州漢墓與漢代社會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劉萃峰

- 2020 〈漢晉之際的東海繆氏〉，《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20.05.28。

鄒水杰

劉蓉

2009 《漢魏名士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鄭紅莉

2005 〈陝北東漢畫像石所見職官考述〉，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十一）》，西安：三秦出版社，頁 276-286。

嚴耕望

1948 《兩漢太守刺史表》，上海：商務印書館。

1990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修訂三版。

鷹取祐司撰，魏永康譯

2018 〈漢代的「守」和「行某事」〉，周東平、朱騰主編，《法律史譯評》第 6 卷，上海：中西書局，頁 94-124。

西嶋定生

1983 〈古代国家の権力構造〉，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頁 302-336。

四・網路資訊

陳垠昶

2013 〈里耶秦簡 8-1523 編連和 5-1 句讀問題〉，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94，2013.01.08，讀取 2021.04.08。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fficial Title of Miao Yu:
With Focus o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inside His Tomb from the Later Han Dynasty

Shuijie Zou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contents of the stone inscriptions inside the tomb of Miao Yu 繆宇 from the Later Han dynasty record that he held the post of “acting magistrate of Lü county in the service of the assistant officer of the principedom minister of Pengcheng” (*Pengcheng xiang xingzhangshishi Lü shouzhong* 彭城相行長史事呂守長), a title which has been understood with divided opinions by academia. Compared with seven similar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 analysis shows that he was a lesser official of the principedom, and the minister appointed him as acting magistrate to hold the official seal of Lü county (indicated by *Lü shouzhong* within the title) as well as carrying out the duties of the assistant officer (indicated by *xingzhangshishi*). In this way, it was not two official posi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but rather two sides of one official title. The tombs of Miao Yu 繆宇 and Miao Yu 繆紆, which are located at the same burial site and were erected at almost the same time, show that both figures were of the same clan, were lesser officials of the principedom, and were acting magistrates—albeit of different counties. The present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Miao clan was a large family that wield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Pengcheng. Moreover, they maintained favorable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authorities, thereby being heavily relied upon by the minister of the principedom in regards to govern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ior and lesser officials thus reinforced each other, which shows one mode of governing in the mid- to late Later Han dynasty.

Keywords: stone inscriptions inside the tomb of Miao Yu; *Pengcheng xiang xingzhangshishi Lü shouzhong*; lesser officials; influential local family